

## 另一種「美國例外論」的產生

### ——莫斯科的權力鬥爭與美共「美國例外論」的產生

◎ 賈慶軍

由德國社會學家沃納·松巴特和美國學者西摩·李普塞特挑起的關於「美國例外論」的爭論已眾所周知了。然而還有一場「美國例外論」的爭論仍是鮮為人知。這就是美國共產黨內關於「美國例外論」的爭論。

美共的「美國例外論」是如何產生的？它的內容是甚麼？它與現今所說的「美國例外論」有何異同？美國到底有沒有「例外」，「例外」在莫斯科眼中的地位如何？美共的「美國例外論」的命運如何？為何會有此命運？這一系列的問題都有待於解答，本文先嘗試著回答前兩個問題。

通過與莫斯科的幾番交流，到了二十年代中期以後，美國共產黨<sup>1</sup>的領導人愈來愈習慣於共產國際的命令式管理，也愈來愈善於利用莫斯科的風吹草動來為自己的前途早作打算了。然而就是這種毫無怨言的順從也使他們難逃被批判的厄運。美共的「美國例外論」是順從共產國際的結果，也是後來共產國際批判它的原因。這樣的悖論現象也只有在莫斯科那裏才能完美地展現出來。正所謂「成也國際，敗也國際」。下面就詳細闡述這一奇怪的歷史現象。先要從蘇共及共產國際那令人眼花瞭亂的路線鬥爭開始。

### 一 莫斯科的王旗變幻

共產國際和俄共[1925年12月俄共（布）改為聯共（布）]的組織形式本身就決定了這樣一種現象，即權力中心的細微變動和領導人的偶然性情會給整個體系帶來重大的影響。不幸的是，這種組織形式造就出來的官僚的巨大權力潛在地就刺激了各種權力鬥爭。

當列寧逝世後，俄共的幾個重要人物都自覺不自覺地盯住了最高權柄。其中最為明顯地就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等。幾個巨頭的權力鬥爭同他們各自對俄共面臨的國際國內問題的解決方案複雜地交織在一起，最終的結果是：誰的方針路線取得了勝利，誰就攫取了權力；反過來，誰獲取了權力，誰的路線也就自然正確。由此產生的影響是，每一套方案都不可能是對現實的客觀反映，它們都或多或少地染上了爭權奪利的色彩。隨著權力的不斷易手，路線的不斷交換，漸漸成為俄共的私有財產的共產國際也跟著搖擺動盪起來。崇尚必然和惟一的共產國際一時間成了機會主義的大本營。「美國例外論」就是這樣一個大背景的產物。共產國際的機會主義路線造就了它，又很快淹沒了它。因為在權力的飄忽不定的本質下，任何東西都不會長久留存。

同「美國例外論」有直接關聯的是布哈林與斯大林之間的權力鬥爭，但由於此次鬥爭與前幾次鬥爭緊密相關，所以本文不得不在這裏對這一系列的鬥爭梳理一番，以瞭解莫斯科路線鬥爭的本質及其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

### （一）托洛茨基與三駕馬車

在幾個革命元老中，托洛茨基的實力最為強大，他也是向著權力發起進攻的先鋒。托氏有個致命的弱點，就是非常自負。心性一起，他不會把任何人放在眼裏，甚至是列寧本人。

在1923年10月，列寧還未去世時，托氏就急不可待地發言了。他選擇的陣地是黨內民主問題。列寧也注意到了黨內愈來愈嚴重的官僚主義問題，但他已不能召集會議來討論這一問題了。托氏提出這個問題，一是由於列寧的囑托，一是由於9月出現的工廠工人罷工事件。這表明了官僚主義問題的緊迫性。然而托洛茨基提出黨內民主問題的方式使我們看到了他的另一個動機，這就是對權力的要求。他以個人的名義給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寫了一封批評信。這一姿態不僅表現了他對黨紀的蔑視，更是他對所有其他黨員的輕視和嘲諷。也許正是這種傲慢自大的態度使他本來很合理的觀點也被大部分黨員拒絕了。在信中，托氏說：「十二大以前基本上形成的和十二大後得到最後鞏固和完成的制度離開工人民主比軍事共事共產主義最嚴酷時期的制度還要遠。」一周以後，和托氏有同感的四十六名俄共（布）幹部也聯名致信中央，認為「黨內所形成的制度已經無法忍受。這個制度扼殺著黨的自主性，黨被精心安排好的官僚機構所代替，」這樣下去會導致國家的滅亡和革命的失敗。<sup>2</sup>這46人可能是真想促進黨的制度的改革，而托氏的主要目的是挑戰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和斯大林在政治局中的權力，尤其是前面的兩人。此時加米涅夫是人民委員會和政治局會議的主持人，季諾維也夫是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和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虛榮心很強的季諾維也夫曾在加米涅夫的支持下提出要由他承擔黨的主要「領袖」、理論家和列寧主義的解釋人的角色。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斯大林此時權力並不大，而且在「列寧的遺囑」事件之後，斯大林變得謹慎、馴順多了。他公開支持季、加工人在中央的領導地位，因為他們在上述事件中保護過他。所以迎接托氏的挑戰的主要是季、加二人。

對季氏和加氏來說，托氏如此關心民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為大家都知道，托氏是一個行政命令至上的推崇者，他提倡民主是在借題發揮。季、加二人開始想以托洛茨基是在進行派別分裂活動為由將黨內民主問題壓下來，悄悄地制服托氏。然而官僚主義已確實令人們難以忍受，各級黨組織要求民主的情緒被托氏的批評信引發了出來。不進行公開討論是說不過去了。

於是季、加二人改變了策略，採取了一種更為隱蔽也更加厲害的手段，即允許民主問題的討論，但要將討論的優先權抓在自己手中，將辯論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意志之下。所以季諾維也夫先發制人，於11月7日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一篇充滿批判精神的文章，其中寫道：「近來，在黨內生活中真是風平浪靜了，有些地方甚至簡直就是停滯不前。」因為「幾乎所有重要的問題都是上面決定了後再下來。這就使廣大黨員群眾的創造性受到限制，使基層黨支部的自主性減少了。」怎麼辦呢？「為了較滿意地解決上述各項任務，為了適應正在引起我們注意的國際事件，為了使黨內生活更加積極起來，……我們需要在實踐中運用黨內工人民主——加強黨內關於一般政治、經濟及其它問題的自由辯論，特別是把普通黨員的注意力集中到有關生產方面的迫切問題上去。」<sup>3</sup>《真理報》還號召就季氏的文章在報刊和黨組織內展開最廣泛的辯論。這一招果然見效，季、加二人通過奪取對手旗幟的方式化解了對手的攻勢，

托氏的擁護者們立時被俘虜了過去。大家最後是一團和氣，並通過了一個決議，將所能想到的最能表達民主、自由的辭彙全部搜羅了進去，例如，「只有經常的、生氣勃勃的思想生活，只有經常批判地研究自己的過去，改正自己的錯誤，只有集體地討論重要的問題，才能保存我們的黨象它在革命成功之前和革命當中剛形成的那樣的黨。……為了避免派系的產生，就要求黨的領導和機關傾聽黨內廣大群眾的呼聲……不要濫用『黨的紀律』壓人（著重號為筆者所加）。」<sup>4</sup>

那麼托氏、季氏、加氏等是真正關心黨內民主嗎？當然不是。黨內民主問題只是他們進行權力鬥爭的一顆棋子而已。他們各自在這一問題上採取的立場主要是為奪取主動權服務的。他們並不在乎自己喊的是甚麼，主要的是自己喊得聲音比對手要高、要更響亮。他們的追隨者真得要民主嗎？也令人懷疑。從資料上看，他們更關心的是要聽到和看到領袖們四處許諾、發誓的樣子，而他們自己則在這種言語的狂歡中發洩了不滿的情緒。至於是否真正以制度的改革來保障他們的民主就超出了他們的意識範圍了。所以我們就不必奇怪為何充斥這場民主辯論的話語都是空洞無物、漏洞百出了。就是前面引用的決議中的話也是自相矛盾的：既然目標是避免派系的產生，也就是清除不同意見，那麼還有甚麼民主討論呢？

從列寧開始建立的布爾什維克黨習慣了地下活動方式，它的秘密性、命令性和軍事色彩使它談不上甚麼民主性。再經過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契卡制度的加固，布爾什維克黨的民主更成問題了。軍事共產主義模式不改變，真正的民主是無從說起的。當俄共（布）仍以舊的黨章、舊的組織方式和思維方式來大說特說民主時，無論其辭彙多麼豐富、許諾的民主權利多麼廣泛、優越，它們都是空中樓閣。問題不在於說出來的民主權利的豐富多彩和無限崇高，而在於是誰說的，他是依據甚麼來說的，他的依據能否真正保障得了這些民主權利。因為希特勒許諾給他的人民的東西比任何人都更多、更美好，但結果又是甚麼呢？同樣，在這裏，托氏、季氏、加氏等人把民主權利說成了一個萬花筒，但他們卻都想站在萬花筒外面以絕對的權力來封住它或毀掉它。就像黑格爾一樣，說盡了天地間的變化，最終卻把它們全收進了他的細如鋼絲般的抽象絕對理念裏，使萬物生於斯也死於斯。現在這一絕對理念就掌握在俄共（布）領導手中，他們能說出萬般民主權利，也能收盡萬般權利。收與發都是那麼神鬼莫測，最終除了收發人的權力之外，甚麼權利都難以留存。而且，就是這場空洞的辯論所達成的空洞的決議也未能收入聯共（布）和蘇共決議彙編裏。人們在一陣狂歡之後就心滿意足地散去了。然而一切都靜寂如昨。

唯有一個人心裏不甘，這就是托洛茨基。民主問題的辯論是他挑起來的，他已大獲全勝，然而他卻覺得這勝利中有著說不盡的空虛。他想要的是權力，而不是空洞無物的勝利。在季、加二人的精心設計下，托氏好像朝著虛空打了一拳，政治局的權力毫髮無損。不能就此甘休，1923年12月8日，托氏又寫了一封題為《新方針》的公開信，繼續攻擊黨中央的官僚主義，他說這些「列寧的學生們」正在蛻變為官僚主義分子，只有青年是黨的最準確的晴雨錶。

如果說上一次攻擊的時機的恰當抵銷了他的傲慢自負的負面影響的話，這一次他則毀在了自己的傲慢性格之下。在文章中托氏將列寧的門徒貶得一無是處，而他自己則高高在上，儼然一副真理化身的模樣。他天真地認為，只要他說出了真理，「列寧的學生們」就會馬上跑過來支持他，因為就連列寧也說過「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但是這次托氏錯了，他忘了人們的脆弱本性使他們往往並不認同真理，而只認同自己的利益。列寧也不例外，在列寧說那句話的時候，正是布爾什維克（多數派）同孟什維克（少數派）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那時孟什維克聯合其他黨派變自己的少數為多數，而布爾什維克反而成了少數，列寧當然不

能支持孟什維克而反對自己，所以才說了那句著名的話為自己辯護。而且後來列寧也從贊同客觀的真理漸漸承認階級的真理，即真理是為利益服務的。而此刻托氏的真理冒犯了他以外的所有人的利益，也就是他們的真理，他們自然會為了他們的真理（也即他們的利益）而推翻托氏的真理的。更何況托氏只是一個人，犧牲他的真理和利益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就連托氏以前最堅定的擁護者及《四十六人來信》的參與者也走向托氏的反對者之行列。因為他們都是「列寧的學生」，跟隨托氏給他們所帶來的損失比反對他要大得多，而托氏要否定的黨機關正是他們的利益得以維持的根基。所以，即使托氏所說的是客觀真理，他們也不會讓他來領導他們。

季、加二人放手讓各級黨組織就托氏的《新方針》進行辯論，因為他們明白優勢已然在他們這邊，他們對上一次辯論的巧妙控制使他們贏得了大多數黨員的支持。這次辯論的結果是，支持托洛茨基的黨員在各級組織中平均只達30%左右，甚至在軍隊中（托氏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和陸海軍人民委員）他的支持率也只有28.5%。<sup>5</sup>季氏、加氏等終於有機會反攻了。

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與斯大林達成了某種「協定」，前二人答應斯大林，在列寧死後不公開列寧的遺囑，也不將斯大林從總書記崗位上撤下來，而斯大林則表示支援季諾維也夫在黨中的領導地位。<sup>6</sup>做著領袖夢的季、加二人將斯大林拉上他們的戰車來對付托洛茨基，不久他們就嘗到了這一行動的後果。三人在1924年5月召開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向托氏發起了進攻。他們指責托氏企圖搞個人領導，破壞集體的團結和統一，而大部分中央委員也同他們一起將托氏看作黨的最大威脅。三駕馬車成功地給托氏及其支持者扣上了一頂帽子——「黨內的小資產階級傾向」。這頂帽子為此後給托氏及托派定罪起了關鍵作用。三駕馬車還使大會通過了一項決議，規定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有權以三分之二的票數把任何一個違犯黨紀和從事派性活動的中央委員從正式中央委員降為候補委員，甚至有權開除他，這顯然是針對托氏的。自此，黨內民主問題不僅不了了之，黨的集中和專斷傾向反而得到了加強，因為此後任何的不同意見都可被視為派性活動而被禁止。當季、加等人以後埋怨斯大林的專斷和黨內缺乏民主時，不知是否會想起他們也曾為黨的專斷權力出過不少力。

花這麼多筆墨來描述莫斯科的權力鬥爭是為了更清晰地認識莫斯科路線鬥爭的發展脈絡及其規律，並由此來幫助我們理解一系列的蘇共和共產國際路線變換的複雜現象。

正是十三大定下了對付不同意見的調子，為莫斯科之後對不同派別的清洗提供了依據。在此之前列寧還未達到對不同意見者的如此嚴厲的處罰的地步。因為對列寧來說，對付不同意見只需動用他巨大的聲望、雄辯的言辭和靈活的工作技巧就足夠了，不必求助於暴力行政手段。而他的接班人則明顯力不從心，不得不借助於行政力量將不同意見壓制下去。所以蘇共的黨政機關並非像列寧希望的那樣愈來愈民主、開明，而是愈來愈專斷、粗暴。但是從本質上看，列寧及其接班人都崇尚思想的統一和意見的一致。不同的意見必須要消滅掉，這是認同馬克思的真理觀的首要前提。在這一點上，全黨上下是一致的。從列寧的理論征服到季諾維也夫、斯大林的行政壓制沒有質的差別。更進一步說，後者的行為正是真理唯一實在論的自然延伸。所以麥德維傑夫在其《讓歷史來審判》一書中稱讚列寧而貶低斯大林是不得要領的，因為從專斷精神上看兩者並無差別。當理論說服不足以清除異見時，列寧也會求助於行政手段的，如契卡這樣一個超越法律的暴力機關也是經列寧的同意才建立的。斯大林則是更為頻繁地使用暴力手段來達到列寧和托洛茨基想要達到的目標而已。既然如此，為何要五十步笑百步呢？

## （二）宗派鬥爭的國際延伸

自從季諾維也夫從十三大領得了尚方寶劍後，托氏此後的任何反抗都不僅不會動搖黨中央的權力和威信，而是只能不斷地刺激它打擊異端的力量增長。在崇尚真理唯一實在的政體中，反對派是不會存活下去的，除非它的力量超過了先前的主流派。而且反對派戰勝了主流派後，它就成了新的主流派，照舊不會允許反對派存在。而且大家都知道，反對派的力量總是弱小的，所以異見總會消滅。這就是為何托氏要求民主的口號導致的卻是蘇共權力的集中的原因——即托氏已成了異端。

十三大之後，季氏也敢於將蘇共內部的爭論拿到共產國際上來了，他要將反對托洛茨基的運動散播到各國共產黨之中。他將托氏的觀點稱為托洛茨基主義。這是共產國際中第一個違背列寧主義的體系。給其定罪的標準不在於其觀點的正確與否，而主要是它是否同「列寧主義」相符。但「列寧主義」的闡釋權都控制在中央主流派的手中，也就是在宗派鬥爭中的勝者手中。

關於如何給托派定性的問題著實讓莫斯科費了一番腦筋。托洛茨基的不同意見不僅表現在黨內民主問題上，還表現在關於新經濟政策、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和共產國際的路線問題上。按照傳統的歸罪方式，托氏在黨內民主問題上犯的是「右傾」錯誤，因為他的民主要求助長了黨內宗派傾向，迎合了資產階級對俄共的民主問題的攻擊。這樣托氏就同資產階級站在了一起，這是明顯的「小資產階級傾向」；在新經濟政策問題上，托氏犯的是「左傾」錯誤，因為他攻擊該政策助長了農村中的「富農傾向」，是無產階級對農民的讓步，他要求對農民進行剝削，積累原始資本，為社會主義工業奠定基礎；在一國建立社會主義問題上，他既向「左」傾也向「右」傾，他認為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完全勝利只能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一同到來，所以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這被季、加等人批評為「失敗論」，是右傾），當前的任務是加強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這導致的卻是共產國際的激進路線，是左傾）。蘇共與共產國際最後以一個很具創造性的名字為托派定了性——「講著左派激進言辭的右傾集團。」

對季諾維也夫來說，共產黨人犯「左傾」錯誤顯得不倫不類，「因為沒有比列寧主義這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更左的東西了」<sup>7</sup>。所以，若是有些黨員以「左」的名義來攻擊列寧主義是右傾就成了笑話了。黨內這些所謂「左」派或極「左」派就不能稱為真正的左派。就他們攻擊堅持走列寧主義路線的蘇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行為來說，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表現，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同盟軍。所以要將托派打成右傾。這樣一來，就再也沒有人敢批評當權者的左傾或右傾錯誤了，說它「左」的話，它本就是左派政黨；說它「右」的話，你就是站在虛假的「左」的立場上來否定它的正確性和權威性，也就是站在敵人一方來攻擊它，因此，成為右傾的是你而不是它。當一切反對派都可以被打成右傾時，主流派不僅能夠放手壓制和清除這些反對派，而且它還能獨佔革命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從此它的一切行為都將在列寧主義的旗幟下得到辯護。也正是如此，真理的客觀標準也就不復存在了，一切標準都由主流派來定。無論主流派的觀點是否正確，它都能被辯護為真理，而反對派的觀點則都是謊言，都要被扣上各種帽子來加以清除。正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呢？所以我們就不必奇怪工業化的思想在托氏手裏是反革命思想，而到了斯大林手裏就成為真理了。

托洛茨基的所有觀點都成了眾矢之的，托洛茨基主義也成了共產國際打擊的對象。1924年7月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關於蘇聯問題的決議是在國際範圍內打擊托洛茨基主義的開

始，該決議支持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作出的關於譴責反對派的綱領是小資產階級傾向，是威脅黨的統一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行為的決議，決議警告各國共產黨說：「大會還觀察到俄國共產黨內反對派受到了其他黨內的集團的支持，如在波蘭、德國和法國等黨內。這表明了這些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偏離跡象，就像俄國共產黨內反對派一樣，這一跡象已被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所譴責。」<sup>8</sup>法共當場就為共產國際反托洛茨基主義提供了機會。在此次大會上通過了關於蘇瓦林委員會的決議，將托氏在法共中的支持者蘇瓦林開除了法共，因為他散播托氏的《新方針》，並仿效托氏攻擊法共的過度集中化和機械化。共產國際譴責蘇氏的行為是「由小資產階級精神所操縱的，這種精神將個人感情置於黨的利益之上」。所以，各國共產黨要「嚴厲懲罰所有違紀行為以及所有的個人政策，無論是由黨內的甚麼成員做出的」<sup>9</sup>。這就給共產國際提供了利用各國共產黨壓制不同聲音的先例。

自此，共產國際的路線便隨著俄國共產黨的內部鬥爭而做了一次調整，其具體的方向是針對托洛茨基主義而定的：在組織上，共產國際和各國共產黨關閉了民主化的大門，轉而走向布爾什維克化，即更加地集中化、紀律化和鐵板一塊。正如季諾維也夫所說：「如果關於各國布爾什維克化的決議不是空話，那麼，我們就需要鐵的紀律，我們就應當根除社會民主主義、聯邦主義、『自治制』等等的殘餘」<sup>10</sup>；在統一戰線中，對農民的關注有所提高，這是對托氏蔑視農民的抵制；季氏曾說：「誰不善於在農民中間工作，誰就不是列寧主義者」<sup>11</sup>；在關於同改革工會、社會民主黨的合作方面仍持溫和立場，以對抗托氏的雙重工會政策。可以看出，這種路線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客觀的標準，它更多地是為同反對派鬥爭而制定。只要是反對派的觀點，不論正確與否，共產國際統統以其對立面的政策來應對。如果說反對派是機會主義的話，那麼處於同樣邏輯中的共產國際又是甚麼呢？事情到此並未結束，還有更多、更複雜的鬥爭正接踵而至。

### （三）權力的重新組合

1924年秋《十月的教訓》一書的發表是托氏對俄共中央的最後一擊。他獨有的傲慢自大姿態不僅未有收斂，反而更見張揚了。在書中他將十月革命的功勞幾乎全歸在了他的名下，就連列寧他也不放在眼裏。不過他主要攻擊的對象還是現下當權的季、加二人。托氏嘲諷這兩人在十月革命中的投降立場，並將他們現在扣給他的「右傾」帽子仍還給了他們。

然而在季、加等人已經精心建立起來的清除異端的機制面前，托氏此舉無異於自掘墳墓。季氏等在俄共和共產國際內發起的布爾什維克化浪潮著重強調的就是黨內以及共產國際內的鐵的紀律。思想的統一和行動的一致是列寧主義者自認為優越於其他政黨的根本特徵之一。每一個列寧主義者，包括托氏在內都對此原則推崇倍至。這樣一來，托氏的行為與其本身的信條便出現了矛盾。即他的行為破壞了黨的團結和統一。所以季氏等人根本無需對其攻擊的內容多費唇舌，也用不著辯護，只需一句破壞黨內團結就可以置托氏於死地。既然大家都遵循著同一套話語，同一種邏輯，誰的指責更有力命運就傾向於誰。而已被打成反對派的托氏是毫無優勢可言的，即使他把自己說成了上帝，他也是一個異端的上帝。

果然，托氏受到俄共中央的一致譴責，季、加二人決定乘勢利用十三大的決議將托氏開除黨籍，永絕後患。但斯大林反對這麼做。對野心極大的斯大林來說，托氏已構不成主要的威脅，他的主要對象現在變成了季、加二人，留住托氏對此二人是一個牽制，他可以在他們雙方纏鬥的力量消耗中坐收漁翁之利。已漸漸被斯大林控制的多數中央委員支持斯大林的建議，所以在1925年1月的中央全會上並未開除托氏，只是免除了他的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和陸

海軍人民委員之職，降其為中央租讓委員會主席和全蘇最高經濟會議產品品質特別委員會主席。托氏的政治生命已開始黯淡下來了。

在俄共中央地位不斷上升的布哈林將托氏被免職的消息通報給了各國共產黨，在1925年4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五次會議上，各國共產黨一致譴責托洛茨基的反列寧主義行為，支援俄共的行動，表示「完全地和徹底地支持俄共中央委員會的決議」。並決心在各黨內展開同布爾什維克化運動的反對者的鬥爭。<sup>12</sup>

正是布哈林在三駕馬車對付托洛茨基的鬥爭中充當了主要辯手的角色，也正是這個布哈林對「美國例外論」的出現起著重要作用，他的思想發展及其在莫斯科的命運是本文研究的一個重點。

布哈林被列寧譽為黨內「最可貴和最大的理論家」，他在傳播馬克思基本原理方面的貢獻甚至超過了列寧。如果說其他人在對待真理問題上都多少有些曖昧的話，那麼布哈林是唯一的一個認真對待真理也死於真理的人。在托氏與三駕馬車的鬥爭中，布哈林被後者選中正是因為他是真正為列寧的新經濟政策辯護的，而不是為了反對托洛茨基本人而反對他。布哈林原本提倡一切經濟活動的「國家化」、勞動軍事化以及普遍的配給制。他同托氏一樣認為社會主義就是一個全國性的永久的勞動營：使用員警和軍隊的力量強迫全體人民按照國家所規定的地點和條件去工作。因為雇傭勞工消滅之後，就只有強迫勞動了。員警強制就成了分配「人力資源」的唯一手段。但是建立在群眾性恐怖基礎上的經濟政策受到了農民的反抗，導致了20年代初的糧食收購危機。這使布哈林和列寧都改變了原來的設想，轉向新經濟政策。給全國性勞動營注入了一絲活力。<sup>13</sup>

列寧去世後，布哈林是繼承和發展新經濟政策的代表人物，布哈林認為，國家對農民展開全面進攻，在經濟上是沒有效果的，在政治上是災難性的。俄國的發展不應當依靠最大限度地剝削農民，而應該依靠保留市場並使之成為國家與農村經濟之間的一種紐帶。增加農業生產的唯一辦法是提供物質刺激，而不是使用行政強制手段，否則只會導致農民厭惡耕種的情緒。這是不利於「國家和無產階級」的利益的。向富裕農民宣戰以及在農村煽起階級矛盾，不但會毀了農業，而且會毀了整個經濟。幫助貧農和農業工人的辦法不是靠毀掉富農，而是要靠國家利用富農的資金，因此必須首先允許富農進行積累。布哈林還創造性地提出了合作化理論：「我們究竟應當怎樣吸引農民來參加我們的社會主義組織呢？只有使用讓農民關心經濟利益的方法。合作社應當用使農民獲得直接利益的方法來吸引他們。」<sup>14</sup>各式各樣的合作社而不只是集體農莊也是農民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不僅貧農、中農可以創立和參加合作社，富農也可以成立自己的合作社，或加入別人的合作社來促進社會主義建設，這樣不必使用暴力手段就會使全體農民，包括富農，融入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之中，為最終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奠定基礎。所以布哈林向全體農民們發出了號召——「發財致富吧！發展自己的經濟，不要擔心有人壓制你們。」<sup>15</sup>這就是布哈林後來受到攻擊的具有「富農傾向」的經濟思想。

布哈林以上述理論為基礎，先是同托派辯論，隨後又同托、季新反對派辯論。而斯大林則利用布哈林來逐一打擊他的對手。在同托洛茨基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辯論中，布哈林批判他們提出的用行政強制手段來獲取原始積累的理論，認為這無異於同資本主義國家一樣，是對小生產者的一種剝削和災難。這同無產階級的優越性是不相符的。而且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是工農聯盟，托氏的「國內殖民化」意味著不但要進攻富農，而且要進攻整個農村，這必然

導致工農聯盟的破裂。最終造成無產階級專政的毀滅。托氏等則認為布哈林的政策將會穩步增加私有主（特別是富農）的經濟力量，削弱社會主義工業和工人階級，使無產階級專政以失敗告終。布哈林則認為農村積累根本不是同工人的利益相違背的，而是與之吻合的。反對者則認為剝削者同被剝削者間不可能有利益上的一致，富農既然在定義上是剝削者，那麼幫助富農積累就是保護了階級敵人。<sup>16</sup>

雙方的觀點看似有很大的區別，然而細一分析，我們便會發現，他們都是在同一個框架下就其不同部分而產生的爭論。同一個框架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雙方都對無產階級專政的穩固與發展給予根本性的關注，都對社會主義工業化最終戰勝資本主義深信不疑。不過布哈林更注意發展的過程和發展的平衡，儘量避免殺雞取卵的過激行為。他認為工業化不應以政治和經濟的劇烈動盪為代價；而反對者則更關注最終結果，他們想通過行政手段來加速工業化的實現，早日見到社會主義的勝利。在他們眼中萬能的行政力量會使社會以及社會中的人像棋子一樣聽從他們的安排，他們的意志就如上帝一樣。

在無產階級意識形態中，雙方各有千秋，前一立場更注重現實，易為現實的人接收；後一立場更注重理想，易於激發人們的浪漫激情。本來雙方在意識形態上沒有根本衝突，然而在宗派鬥爭的狀態下，他們都各執一端來相互指責。攻擊的結果是雙方都成了一個矛盾的混合體。布哈林及其支持者在經濟上是偏右的，（即向農民甚至是富農讓步），在政治上卻是偏左的（攻擊托派們以民主口號分裂黨，支持黨的集中化）；托派在政治上偏右（即要求黨內民主），在經濟上卻是偏左的（向農民發起進攻）。這樣的矛盾正便於為斯大林所利用來將他們各個擊破，他可以用托洛茨基等經濟上的「左傾」觀點來攻擊布哈林等在經濟上的「右傾」觀點，用布哈林在政治上的「左傾」觀點來攻擊托氏等在政治上的小資產階級傾向。最終斯大林便可以達到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左」的完善統一。後來的事實證明布哈林在經濟上的溫和路線和托洛茨基的政治民主訴求都是走不通的，因為他們頭頂上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意識形態帽子過於沉重了。他們最終面臨的選擇是：要麼拋棄自己的觀點，要麼拋棄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答案不說自明。因此我們就不必奇怪布哈林在後來心甘情願地接受人們對他的批評和審判，而托洛茨基在流放途中還大聲喊著要支持斯大林。

當托洛茨基不足為懼後，斯大林就開始利用布哈林來對付季、加二人了。在布哈林、李可夫等與季、加等就新經濟政策問題發生衝突之前，斯大林已多次找季、加二人的碴了，如「新經濟政策的」一詞的錯拼問題，「黨專政」問題等，<sup>17</sup>直到上述衝突爆發時他才找到最佳機會。

季、加二人為自己頻頻遭到斯大林的攻擊而警覺起來，面對勢力逐漸強大起來的斯大林，他們開始感到自己的主要敵人已成了斯大林而不是托洛茨基了。所以他們急忙調整立場，逐漸向托氏靠近而對斯大林、布哈林等批評起來。托、季、加等人想在新經濟政策問題上駁倒斯大林、布哈林，奪取中央領導權。真正交鋒的是布哈林、李可夫與季、加二人。後者認為應加強對富農的壓力，部分地恢復「軍事共產主義」政策，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他們認為目前的新經濟政策就其主流來說是退步的；前者則支持新經濟政策的進一步實施，並提出了著名的「發財致富吧！」這一口號。斯大林則採取了一個巧妙的立場，他支持布哈林等人的基本立場，但又要同他們保持距離，以便將來利用「發財致富吧！」這一口號來打擊布哈林。在1925年12月的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承認黨內存在兩種傾向，一是對富農危險的估計不足，一是誇大富農危險。斯大林提議先「集中火力反對第二種傾向」，因為他先要擊敗季、加二人。在打擊季、加二人的同時，斯大林還讓布哈林承認了「發財致富

吧！」這一口號是錯誤的，這為他以後對付布哈林埋下了伏筆。

季、加二人很快就嘗到了同托氏一樣被打成異端的滋味，也領教了他們親手加固起來的黨紀的厲害。他們所調集起來的人馬被斯大林的支持者們打得七零八落，當他們在十四大上抨擊黨的禁錮制度時，斯大林以他們不久前對付托氏的觀點來反擊他們：「反對派同志們難道不意識到：對我們布爾什維克來說，形式民主只是一個空殼，而黨的真正利益則是一切嗎？」以後斯大林更明確地說：「黨內民主是甚麼呢？黨內民主就是提高黨員群眾的積極性並加強黨的統一，加強黨內自覺的無產階級紀律。」<sup>18</sup>所以說，季、加二人攻擊黨內民主就是破壞黨紀，是自取滅亡。而當他們氣急而攻擊起斯大林本人，認為他「不能起到統一布爾什維克司令部的作用」時，代表們喊叫起來：「要斯大林！要斯大林！！要斯大林！！！」，並為之長時間的鼓掌。這種歇斯底里的粗俗鬥爭方式在粗魯的斯大林的領導下愈演愈烈，它刺激起的更多的是人們粗俗、低級的情緒，而不是謹慎的思考和推理。這種粗俗的言行在列寧等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已初露端倪，列寧的話語專斷和論戰時的無情責罵早已名揚四海，明明是他自己缺乏邏輯嚴密性，他反而常常責怪認真的布哈林的嚴密論證是「煩瑣哲學的東西」。而正是因為缺少「煩瑣哲學的東西」，革命者們才愈來愈變得武斷與粗俗。

所謂的托、季、加「新反對派」被打得一敗塗地。但他們與其說是被斯大林打敗的，不如說是被自己打敗的，因為他們的要求超出了意識形態所允許的範圍。在他們被意識形態壓服時，不僅不能反抗，還要表示公開地懺悔，如果他們還想生活在這一制度下的話。1926年10月17日的《真理報》上發表了托、季、加三人的懺悔聲明，其中這樣寫道<sup>19</sup>：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期間及大會閉幕後，我們在一系列原則問題上和大會的多數代表及中央委員會發生了意見分歧。我們在正式文件中、在大會的講話中、在中央全會及政治局會議上都闡明了自己的觀點。我們至今還堅持自己的這些觀點。我們絕對反對『宗派和派別自由』的理論和實踐，我們承認這和列寧主義原理及黨的決議是背道而馳的。黨關於禁止派別活動的決議，我們在實踐中有義務遵守。

與此同時，我們應該公開向黨承認，在維護自己觀點的鬥爭中，我們和同我們持相同政見的人們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閉幕後曾幾次採取了違反黨紀的、越出黨所規定的黨內思想鬥爭的範圍，走上了鬧宗派的道路。我們認識到，這種做法是完全錯誤的，並聲明我們堅決拋棄為維護自己觀點而採取的宗派手段，因為這些做法危害了黨的統一，我們號召一切支援我們觀點的同志也這樣做。我們號召，立即解散所有為辯護反對派觀點而成立起來的宗派組織……

我們每個人保證，我們將在黨章、中央和大會決議規定的形式範圍內維護自己的觀點，我們相信，所有這些觀點的正確部分在今後的工作過程中會被黨所接受……。

這是一篇充滿矛盾和僥倖心理的文字，他們既發誓堅守列寧主義原則，又要堅持自己的觀點；既承認自己違反了黨紀，走上了宗派道路，又想要讓人們相信自己的觀點的正確。在這種矛盾話語下顯示他們的一些僥倖心理，他們力圖保持自己的觀點，希望黨員們有一天會接受他們的立場並來支持他們，到那時列寧主義、宗派原則所要懲罰的就將是他們的對手而不是他們了。因為在列寧主義原則裏，真理同時意味著權力，觀點的被承認也就意味著權威的被承認。托、季、加等人也想借助於列寧主義原則來打倒對手，然而他們的時運不濟，失了先機，被扣上了「反對派」的帽子，這就註定了他們的失敗。

果然，這篇聲明發表不久，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就通過了決議，將從事

宗派活動的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清除出政治局，而季諾維也夫早在1926年7月就被開除了。他們越虔誠地擁護列寧主義，列寧主義卻越遠離他們。因為列寧主義現在被斯大林等獨佔了。

反對派受到愈來愈粗暴地對待，當托、季、加等一出現在講台上，台下立刻是喊叫聲和污辱性的咒罵，如「胡說八道」、「卑鄙下賤」、「打倒壞蛋」、「打倒內奸」、「流氓」、

「從講台上滾下去」等等，托氏等人的講話一句也聽不清了。<sup>20</sup>反對派對斯大林的攻擊不僅未給他帶來任何損失，反而使大多數黨員更加擁護斯大林，他們要求把黨內制度更加嚴格起來，限制黨內的辯論，K·雷金的觀點反映了這種普遍的心態：「對這些黨內的騙子一點也不能給予信任，不要相信他們的話，不要相信他們的保證。這些保證他們已重複三次了。愚弄黨愚弄夠了，黨和無產階級不能再忍耐下去。……我們要工作，妨礙我們工作的人要趕出黨，黨內沒有他們的地位。」<sup>21</sup>全黨上下都要求給反對派以嚴厲的打擊，面對群眾的呼聲，斯大林還客氣甚麼。1927年11月，托、季二人被開除黨籍，12月的十五大上又清除了其追隨者75人。1928年1月17日，仍不肯投降的托氏被流放，而布哈林是此事的積極參與者。人們為甚麼會如此暴躁呢？不是因為斯大林比托洛茨基更好，而是因為「他們這樣做是維護他們和斯大林一起制訂和執行的黨的政策」，<sup>22</sup>也就是維護他們既得的權力和利益。

#### （四）布哈林與共產國際

隨著托、季等人一步步的敗落，同斯大林並肩戰鬥的布哈林卻步步高升。作為斯大林的主要理論辯手，自認為無辜的布哈林在共產國際內對托洛茨基窮追猛打，直到將他送出了蘇聯。也正是在他坐陣共產國際的時候，他為美國的洛夫斯頓搭建了「美國例外論」的舞台，而在他離去時，它們也成了他的陪葬品。

1926年10月26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對蘇共中央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的決議作出了反應，該決議寫道：「既然季諾維也夫不能在共產國際代表蘇聯共產黨的路線……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認為不能讓季諾維也夫在共產國際繼續工作了。」<sup>23</sup>主席團所有成員一致接受上述決議，並就此通過一項新決議，其中寫道：「認為季諾維也夫同志不能再作為共產國際的領袖繼續工作了。」<sup>24</sup>到了11月21日，季諾維也夫被迫寫下辭職書，22日，季氏被正式撤職。從此布哈林開始主持共產國際的工作。而布哈林為共產國際制訂的路線以及他對美國的態度是「美國例外論」產生的重要因素。

布哈林的路線部分出於他對國際形勢的較為客觀的考察，部分出於宗派鬥爭的需要。對農民的態度使布哈林在共產國際上強調工農聯盟的重要性，也使他對社會民主黨持相對溫和的立場。他要求與社會民主黨尤其是其左翼合作，繼續貫徹統一戰線策略。這一路線明顯體現在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上。中國民族民主革命在1926、1927年達到了最高峰，共產國際要求中國共產黨同民族資產階級合作，在國民黨的領導下推進中國革命的發展。托洛茨基則攻擊布哈林是在走右傾路線，要求各國共產黨退出同社會民主黨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合作，發動無產階級革命。他明確提出要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斷絕關係。斯大林、布哈林等再次在共產國際內掀起反托洛茨基「在左派言辭偽裝下的右傾路線」的鬥爭。但實際上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布哈林等是偏向「右」的，而托洛茨基是偏向「左」的。到底誰對誰錯呢？雙方各有對錯。一刀切的「右」傾或「左」傾都會帶來矯枉過正的消極後果。而宗派鬥爭促使共產國際愈來愈強調意識形態和組織上的統一，高度集中和一致的要求導致了政策的教條化和片面

化。若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將布哈林的主張用於英、德等國，托洛茨基的主張用於法國、中國等地，共產主義運動的損失可能會減少一些。但由於布哈林的主張被共產國際奉為唯一正確的，所以在不適合其主張的地區共產主義運動損失慘重。例如，在中國發生了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事件後，布哈林仍在要求中共繼續同國民黨合作，並在共產國際開展了一系列清算托洛茨基主義的活動，中共書記陳獨秀由於提出要同國民黨決裂的建議而被打成了托派分子，是「明左實右」的投降主義。而陳獨秀當時的決策是比較現實的，只因這一要求同托洛茨基的立場接近就被扣上了「右傾」的帽子而被否決了。<sup>25</sup>中共由此遭受了重大挫折。現今看來，即使強行給陳獨秀定罪的話，他也應是「左傾」，而不是「右傾」，真正「右傾」的是共產國際。可見共產國際僅僅為了面子，為了同托派鬥爭而不顧具體現實造成的後果是多麼嚴重。托洛茨基曾敏銳地看到了這一荒謬現象，他說，共產國際「領導人的每個錯誤都被當成了對的，這是通過以愈來愈經常的開除手段來壓制反對派而實現的。」<sup>26</sup>正是頑固的意識形態使共產國際具有了顛倒對錯的能力。

但布哈林的路線無意中切合了美國的具體形勢，並使他的美國追隨者演繹出了一套「美國例外論」，這是出乎莫斯科的意料的。

在1926年12月共產國際執委會全體會議上，布哈林在《關於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的任務》的報告中，布哈林承認：「資本主義的穩定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世界生產、國際貿易的增長以及貨幣流通的穩定等）」，同時他還指出：「當前形勢的顯著特徵是經濟力量中心的轉移，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和軍事力量中心的轉移，它們轉移到了非歐洲國家，首先轉移到了美國。」<sup>27</sup>不久，布哈林又承認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美共的弱小，「我們的美國黨太小了，美國資本主義是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大本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我們目前在這個國家的的工作仍是非常有節制的。」<sup>28</sup>在1927年7月的《共產國際關於美國問題的決議》中，布哈林明確承認了美國資本主義仍處在上升階段：「美國資本主義仍然處於上升階段」，美國資本主義能夠「為工人階級的很大一部分提供相對比較高的生活水準」，這就使美國工人階級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在意識形態上是「資產階級化」的，因此美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前景不大樂觀，「在最近不要期望有甚麼大的發展」。當然，布哈林還要在意識形態上安慰美國同志們幾句，「當世界資本主義危機也會擴展到美國時，時機就成熟了。」<sup>29</sup>但美國資本主義仍處於「上升階段」的判斷已自此成了共產國際的官方教條。不曾想這會在美國導演出「美國例外論」的戲劇。

## 二 「美國例外論」的產生

隨著與莫斯科打交道的經驗的增多，美國共產黨人愈來愈適應莫斯科的氣候，愈來愈善於見風使舵。當莫斯科掀起反托洛茨基主義高潮的時候，美國工人黨也在黨內開展了反對美國托洛茨基的追隨者馬克斯·伊斯曼和勞爾的運動；當共產國際決定撤銷季諾維也夫執委會主席一職的時候，美國工人黨代表全力支持這一決定，現在共產國際又作出了關於美國正處在「上升階段」的論斷，美國工人黨又要如何回應呢？工人黨現在的書記傑伊·洛夫斯頓和《共產黨人》月刊編輯伯特萊姆·沃爾夫在共產國際上述論斷的基礎上對美國資本主義和美國歷史傳統進行了重新評價，力圖解釋當前在美國出現的不同於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現象。不成想他們關於這一現象的一系列觀點竟成了莫斯科所批判的「美國例外論」。他們的觀點是甚麼樣的？他們的具體理論背景又有哪些呢？答案包含在他們對兩個問題的態度上：

## （一）關於美國工人階級的「資產階級化」問題

共產國際關於美國仍處於「上升階段」的判斷是符合實際的，但它的解釋除了意識形態的教條外（如甚麼資本主義的潛力仍未用盡等）並未告訴人們甚麼。對20世紀20年代中後期美國經濟的發展狀況做出具體分析和解釋的是幾個美國教授。他們的研究提出了關於美國工人階級的「資產階級化」的問題。

湯瑪斯·卡爾沃和萊克福特·圖格維爾等人提出了「新資本主義論」。他們認為勞工正在轉變為資本家，工人階級正在消失或者說一個新的工人階級正在出現，因為工人們的儲蓄增加了，在公司股份中的投資也增長了，勞工銀行得到了發展。所以美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即「新資本主義」階段。正是這種特徵使美國的資本主義區別於其他國家，當其他國家勞資矛盾重重，經濟危機不斷之時，美國卻仍保持著健康旺盛的發展活力。所以從歐洲來到美國的艾拉·溫特會說，美國資本主義已經給予了工人們足夠的東西，這是歐洲社會主義者們「一直想要的東西，甚至（比這）更多」<sup>30</sup>。言下之意，美國已實現了社會主義者的願望，社會主義在美國經濟領域已經實現，為甚麼還要盼望階級鬥爭、經濟危機呢？為何還唯恐天下不亂，把革命當飯吃呢？人們的最終目標不就是好的生活嗎？

除了「新資本主義」，還出現了「工會資本主義」理論，即由工會集資建立勞工銀行同資本家進行競爭，打破資本家一統天下的局面，使資本主義按照勞工的意願運轉。到了1926年已經有26家勞工銀行建立起來，而且勞聯還建立了聯合勞工生命保險公司。<sup>31</sup>「工會資本主義」大有衝破勞資界限，使全民資本化之勢。這兩種理論其實說得是一個意思，即工人階級正日益變得「資產階級化」，它同資產階級的區別正日益消失，這是資本主義的進步及其活力的體現。對於「新資本主義」和「工會資本主義」美國工人黨又有何反應呢？

黨內的兩大對抗集團，福斯特集團與洛夫斯頓集團雖然對工人階級的「資產階級化」有不同的理解，但在下面這些方面是沒有異議的，即美國資本主義正處於上升階段；帝國主義的「超級利潤」使資本家能夠以高工資和其他利益來「收買」熟練工人；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在將來會崩潰於經濟危機和帝國主義競賽。但相對於福斯特集團來說，洛夫斯頓集團對當前的革命情勢更覺悲觀。對於「工會資本主義」，福斯特強調的是美國工人階級在「物質上的資產階級化」，尤其是掌握在工會官僚手中的巨大財產。而洛夫斯頓不僅強調「物質上的資產階級化」，他更強調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上的資產階級化」，他認為整個工人階級除了很小的一部分外在意識形態上都已被「資產階級化」了，而在物質意義上被資產階級化的卻只有一小部分，大約「幾百萬」左右。雖然出於意識形態上的需要，洛夫斯頓對「新資本主義」進行了一番嘲諷，但他關於工人階級在意識形態上的非革命化的悲觀論調成了以後他的對手們攻擊的主要目標。

福斯特集團中的查理斯·克魯賓當場就嗅出了洛夫斯頓的觀點中的悲觀氣息，他埋怨這一觀點不利於美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洛夫斯頓回敬他說：「我們堅持認為在現今美國盛行的客觀形勢是不利於一個群眾性共產黨的發展的，在黨員中發展這樣一種幻想將是針對黨的一種犯罪，……我們與我們黨的敵人以及那些在關於美國階級鬥爭發展問題上持悲觀觀點的人的不同在於：我們認為這些不利條件是暫時的，是即將過去的。」但洛氏仍然是在說，共產黨目前的狀況是很不樂觀的。他的得力助手沃爾夫也說：「這種上升的趨勢將會對美國工人階級有甚麼影響呢？這種腐蝕部分工人階級的手段將會持續下去並將會使部分工人階級走向右邊。只要美國資本主義仍在上升階級並繼續它的收買，這種狀況就會持續下去。」<sup>32</sup>

雖然福斯特集團持有異議，但由於洛夫斯頓的勢力佔優勢，更重要的是美國仍處於「上升階級」是莫斯科也承認的，所以福斯特也挑不出大的漏洞來。但當莫斯科的氣候發生變化時，一點點的差異就會導致不同的命運。

## （二）關於美國歷史傳統的評價問題

在1926年前，美國共產黨人對美國歷史上的革命及其領導者持否定態度，他們將國父們攻擊為「美國每一個資本家，每一個剝削者及勞苦大眾的敵人」的恩人，將1787年制憲會議攻擊為「反革命」活動，憲法「不是美國革命的產物，而是反革命的產物」。他們還將林肯視為「美國北部工業階級利益的代表」而非「偉大的解放者」<sup>33</sup>。

只有到了1926年，具有知識份子背景的洛夫斯頓、沃爾夫才在美國資本主義仍在「上升階段」這一論斷的啟發下開始注意利用美國歷史傳統為共產主義運動服務。當然此前的觀點也是對美國歷史的一種利用，不過它是在反面意義上的，這對於深受傳統影響的本土美國人來說吸引力是很小的。面對本土美國人這一巨大市場，美國共產黨人逐漸認識到正面利用美國歷史傳統的必要性。

首先改變對美國歷史傳統的評價的是沃爾夫，他於1926年7月在《工人月刊》上發表長文〈誰之革命？〉，在文中他不再稱美國革命領袖為「走私者」和「土地投機者」，而是將美國革命比之於偉大的法國、俄國革命。他認為美國工人階級應該去發現美國及其本土革命傳統的本質。與沃爾夫相呼應的是洛夫斯頓，他在《工人日報》上發表文章將美國革命與共產主義事業聯繫在了一起。他說美國革命也是由少數人接受「外國」的錢財，採用「專政」的方法，以暴力手段進行的，就象現在美國共產黨人所做的一樣。他還將傑弗遜挑出來作為現今美國共產黨人的同路人來進行評價<sup>34</sup>。由此邏輯出發，人們便可以說國父們是過去美國無產階級的代表，而美國共產黨則是現在美國無產階級的代表，美國共產黨人是美國革命傳統的繼承者而非反對者。這無疑會促進美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美國化」。

對美國歷史的如此解讀自然是牽強附會的，從本質上說，共產主義與美國歷史傳統是水火不相容的。美國共產黨人的原則是集體、國家至上，財產公有；而美國憲法確立的卻是個人至上，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即使是美國最為激進的平民黨運動、進步運動，它們的最終目標還是要保障公民的私有財產，保護個人權利，它們反對的是壟斷組織或國家對個人財產和權利的侵犯，而不是要將財產私有制廢掉，因為它們認為財產私有與個人自由是密切相關的，沒有私有就談不上個人自由權利。所以人們一次次地鬥爭只是為了加固私有權，防止私有權被壟斷組織所剝奪。而美國共產黨人設計的國家工廠在他們看來比之資本家的剝削還要殘酷，因為在後者至少人們還有選擇的可能，而在前者則是完全地強制。將這兩種不同的觀念、制度體系放在一起最終會出現這樣一種結果：要麼完全「布爾什維克化」，徹底改變美國的歷史傳統；要麼完全「美國化」，拋棄馬列主義專政學說和階級鬥爭學說。

洛夫斯頓所做的是想要將「布爾什維克化」與「美國化」結合起來，這一矛盾也正是莫斯科的矛盾路線的反映：在蘇聯國內是社會主義工業化要求與農村市場經濟之間矛盾，在共產國際是「布爾什維克化」與「統一戰線」之間的矛盾。總而言之，是整個共產主義世界意識形態上的「左」與現實狀況的「右」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不可能長期存在，深受對立統一辯證法薰陶的美國共產黨人必定要求徹底地克服它，而統一的歸宿當然是那神聖的「布爾什維克化」蘇維埃。洛夫斯頓當然不會反對自己的理想，他的失誤在於他的辯證過程有些拖長

了。當莫斯科已經踏著辯證法回歸「左」的意識形態大本營時，洛夫斯頓還在半路上東張西望。

總的說來，洛夫斯頓等人的觀點並不是甚麼真正的「美國例外論」，他們並未抓住美國歷史傳統的本質，也未能真正理解美國主流意識形態。他們僅是在共產國際的啟發下對美國的現實稍加注意了而已，然而就是這種力圖真實地反映美國現實的願望也為出爾反爾的莫斯科所不容，最終他們被打成了異端，逐出了共產主義世界。

## 註釋

- 1 1925年9月，美國工人黨在其第四次代表大會上遵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將名稱改為「美國工人（共產）黨」，以響應莫斯科「布爾什維克化」的號召。1929年3月美國工人（共產）黨在其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經史達林的允許又改名為「美國共產黨」。
- 2 羅·亞·麥德維傑夫：《讓歷史來審判——史達林主義的起源及其後果》，趙洵、林英譯，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冊，第62頁。
- 3 麥德維傑夫：《讓歷史來審判》（上），第62、63頁。
- 4 麥德維傑夫：《讓歷史來審判》（上），第63、64頁。
- 5 麥德維傑夫：《讓歷史來審判》（上），第66頁。
- 6 麥德維傑夫：《讓歷史來審判》（上），第44頁。
- 7 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社會主義系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文獻史料選編》，第五卷，第220頁。
- 8 德格拉斯：《共產國際文件（1919—1943）》，第2卷，第142頁。
- 9 德格拉斯：《共產國際文件（1919—1943）》，第2卷，第161頁。
- 10 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社會主義系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文獻史料選編》，第五卷，第273頁。
- 11 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社會主義系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文獻史料選編》，第五卷，第242頁。
- 12 德格拉斯：《共產國際檔（1919—1943）》，第二卷，第206頁。
- 13 列·柯拉科夫斯基：〈布哈林和新經濟政策的思想〉，蘇紹智等編：《布哈林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9、130頁。
- 14 亞·厄里奇：〈蘇聯工業化問題的爭論〉，蘇紹智等編：《布哈林思想研究》，第157頁。
- 15 麥德維傑夫：《讓歷史來審判》（上），第79頁。
- 16 蘇紹智等編：《布哈林思想研究》，第135、136頁。
- 17 詳見麥德維傑夫：《讓歷史來審判》（上），第77頁。
- 18 蘇紹智等編：《布哈林思想研究》，第137頁。
- 19 麥德維傑夫：《讓歷史來審判》（上），第99頁。
- 20 麥德維傑夫：《讓歷史來審判》（上），第104頁。
- 21 麥德維傑夫：《讓歷史來審判》（上），第107、108頁。
- 22 麥德維傑夫：《讓歷史來審判》（上），第106頁。
- 23 轉引自德格拉斯：《共產國際檔（1919—1943）》，第二卷，第310頁。
- 24 德格拉斯：《共產國際檔（1919—1943）》，第二卷，第310頁。
- 25 德格拉斯：《共產國際檔（1919—1943）》，第二卷，第391頁。

- 26 德格拉斯：《共產國際檔（1919—1943）》，第二卷，第366頁。
- 27 德格拉斯：《共產國際檔（1919—1943）》，第二卷，第320、321頁。
- 28 Draper, Theodore. *American Communism and Soviet Russian* (德雷珀：《美國共產主義與蘇俄》) New York, 1960, 第272、273頁。
- 29 德雷珀：《美國共產主義與蘇俄》，第260頁。
- 30 德雷珀：《美國共產主義與蘇俄》，第276頁。
- 31 德雷珀：《美國共產主義與蘇俄》，第276頁。
- 32 德雷珀：《美國共產主義與蘇俄》，第277、278頁。
- 33 德雷珀：《美國共產主義與蘇俄》，第273頁。
- 34 德雷珀：《美國共產主義與蘇俄》，第274頁。

賈慶軍 1974年生，男，河北望都人，寧波大學文學院講師，南開大學美國歷史與文化中心博士，現從事美國政治文化史、西方史學史研究。

---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六期 2006年1月27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六期（2006年1月27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